



中国何以为中国

□ 顾 春

中国一词，源远流长，影响巨大。据我国台湾学者王尔敏研究（《“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中国二字出现于先秦古书者，凡一百七十二次，计有五义，一指京师，即首都，二指国境之内，三指诸夏之邦，四指中等国力之国，五指位于中央地区之国，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指诸夏之邦的中国。诸夏族是汉民族的前身，最初的诸夏居于黄河中下游区域，与周边民族相对而居其中，故称中国，《孟子·梁惠王上》中所说的“莅中国而抚四夷”所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与周边的民族相比，诸夏代表着文明和先进，显示着文化上的自豪，对周边民族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先进的诸夏便被称为华，周边的民族便被称为夷，由此就有了华夷之辨，并以此来辨别文明和落后。于是诸夏又称华夏，中国又称中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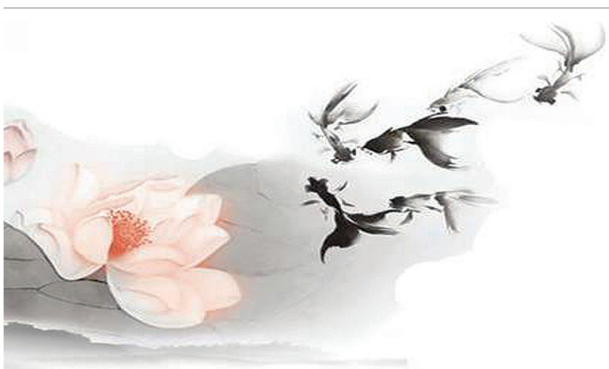
从中国一词的发源看，在有文字记载的商代，就已出现了中国一词的萌芽，如《小屯南地甲骨》1126载：“南方，西方，北方，东方，商。”商居四方之中。而在殷墟卜辞中，又有“中商”的记载，它所表达的意思是，商居中

央，统治四方。而中国一词从周代开始屡见于文字，如《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上天既然把中国的民众和疆土付给先王，所以先王就要施行德政）《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要惠及西周王畿，而且安抚四方）据于省吾考证，“中国这一名称起源于（周）武王时期”，而周公制礼作乐也正是在武王时期。制礼作乐，赋予了中国以丰富的内涵，使中国成为文明和先进的代表，成为其他诸侯国向往和效仿的对象。

按照传统中国人的认识，中国代表的是先进的典章制度和文化，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生活习惯等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凡是赞成并实行中国的典章制度和文化的，夷狄就变成了中国，这是新的中国；虽居中国，而行夷狄之道，也就不再是中国，而是新的夷狄。这种中国观，贯穿了整个古代中国。因此，在文化上，中国的内涵一脉相承，从未改变，但在地理上，中国所指却始终变动不居。比如，在先秦，黄河中下游的各诸侯国被称为中国，而长江、渭河等流域的各诸侯国就不能称为中国。今天的江西、湖南等地，当时虽已纳入中央版图，仍不能称中国。甚至到了明代，今天的云贵地区也不能称中国，直到明代后期的万历年间开科取士，才逐渐被称为中国。

这种中国观，以其先进和开放包容，对古代中国的形成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中国人以自己的先进和文明自豪，逐渐形成了全民族的种族和文化认同；另一方面，中国以其博大开放的胸怀和先进的制度和文化，吸引着周边的民族相继加入中国，历经数千年无数次的民族融合，使中国像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最终形成了现在的中国。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已不再仅仅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主要是中华民族的国家称号。列强以坚船利炮野蛮撞开中国大门的鸦片战争，打碎了传统中国人的天朝上国之梦。当传统的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时候，发现在地理上中国并不居于天下的中央，在文化上更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于是，由思想家魏源发其端，梁启超成其事，最晚至19世纪末，中国逐渐成为一个政治概念。梁启超认为，朝代有更替，国家万古新，应废除以朝代指称国家，而统一代之以中国。梁启超在1900年写就的极为著名的《少年中国说》一文中，以磅礴的气势、如橡的巨笔热情讴歌了未来的中国：“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从此之后，中国就成为我们国家的统一称号。



□ 刘立祥

平阳市场骚乱，小吏初试锋芒

尹翁归幼年失去父母，由叔父抚养成人。虽孤苦伶仃，却自幼志存高远，发奋自强，刻苦修文练武，尤喜练习击剑。每日闻鸡起舞，坚持不懈，挥剑翻飞，如行云流水，出神入化，远近闻名，人莫能当。尹翁归成年后在县里做了一名狱吏。当时，汉昭帝刘弗陵刚刚登基，大将军霍光“初辅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闻其风采”，“帝年八岁，政事一决于光”。霍光独秉朝政，一手遮天，炙手可热，住在平阳县的霍氏家族也水涨船高，霍家子弟及其家奴一个个像打了鸡血似的在当地横冲直撞。他们在市场上持刀寻衅滋事，强买强卖，欺行霸市，为所欲为，人们敢怒而不敢言，管市场的官员束手无策。有人推荐尹翁归做了管市场的小吏。尹翁归走马上任，持长剑当街巍然挺立，平阳市场即刻风平浪静。他一身凛然正气，嫉恶如仇，公平执法，不吃请，不接受任何馈赠，不接受任何人的请托，世风为之大变。不仅霍家人不得不收敛锋芒，变得循规蹈矩，地痞无赖悄然遁迹，整个市场的商人也无不奉公守法，对尹翁归投以钦佩的目光。

□ 陈家兴

褒贬不一的汉武帝

读《史记·孝武本纪》，会对汉武帝刘彻的一生充满疑惑，通篇记述的都是他巡游封禅敬鬼神的故事，似乎没干什么正事。这大抵是因为司马迁因李陵投降匈奴为其分辩而被武帝施以官刑一事之故，而有意把其文治武功忽略或散见于其他臣子列传中。不过，历史上对汉武帝刘彻的评价，也往往褒贬不一。

比如东汉史学家班固，在叙述一番汉武帝的事迹后说：“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意谓《诗经》《尚书》上所称道的古代贤王也不过如此，可以说是极言武帝的文治武功。这一类评价，往往着眼于他征战四方、开疆拓土、远扬国威，以及其他功业。

然而，千年后的司马光在列叙“班固赞曰”后，即来了一段“臣光曰”，则多有贬抑：“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显然，司马光对秦始皇的评价比较负面，而在他眼里汉武帝和秦始皇没什么两样。这一类评价，往往着眼于他穷兵黩武，“内穷侈靡，外攘夷狄”，结果就是“天下萧然，财力耗矣”。

但在用人上，积极正面的评价居多，司马光与班固两人意见亦相类。司马光在记叙汉武帝逝后写道：“帝聪明能断，善用人，行法无所假贷”，可谓盖棺定论。班固则早就称赞：“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

当然，在司马光看来，天下的人才是不缺的，关键在你想干什么，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才为你所用。他这样写道：“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锐轻死之士充满朝廷，辟土广地，无不如意。及后息民重农，而赵过之传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别，而士辄应之，诚使武帝兼三王（夏禹、

好贤不倦 诛赏严明

——汉武帝刘彻用人史话（上）

商汤、周文王）之量以兴商、周之治，其无三代之臣乎！”隐含的意思是，治国大略决定了用人谋略，要是把治国大略重心放在造福百姓上会更好，就能复兴商周时期的太平盛世，而相应的辅佐人才也会辈出。

汉武帝的治国思路转变固是事实，而武将文臣为之用亦是事实，但前提仍然是汉武帝善于任用贤能。倘若不善用人，则空有雄略而不能尽展。再好的江山，也会如秦二世胡亥般三年玩完，不会延运日久。

广纳贤才

事实上，汉武帝是以延揽人才来开局的。公元前141年正月，刘彻16岁即帝位。第二年冬季十月，即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亲自出题“问以古今治道”。事实上，在今天看来，这是在同一年，因为古代纪年都是从冬季开始的。也正是在武帝任上，于公元前104年夏季五月改正朔，他命公孙卿、司马迁等拟定汉朝《太初历》，以正月为一年开始，延续至今。

以广纳贤才来开治理之新局，是为雄主治国理政的大气象。

当时有一百多人参加考试，其中广川人董仲舒写了一篇很长的答卷，汉武帝很赞赏，当即即任命他做江都国的相。其中关于用人之道，也有一番论述，对汉武帝当有潜在影响。

董仲舒在策论中针砭时弊：“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遂郎吏又以富誉，未必贤也”，“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官吏大多是官二代、富二代，这哪能选出贤能之士？同时还凭资历就能得富贵、升官职，这样的用人思路显然会堵塞贤路。

董仲舒建议：让列侯、郡守、二千石官秩的官员，各自从所管理的官吏、百姓中选择贤能的人，每年向朝廷选送二人，而且能够“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把举荐贤能作为对官员考察的重要依据，这实际上是一个制度化的举荐贤才措施。贤才举荐来了怎么办？“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

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意谓不重资历，而重实际能力，根据才能大小、品行高低来任用。这样的用人思路，在当时可谓超前，即便在今天也很有价值。

事实上，汉武帝即位开始，还在全国选拔“文学材智之士”，予以破格重用。当时，便有很多人上书议论国家政事得失，自我标榜自我推荐的人数以千计，汉武帝从中选拔杰出的人才给以宠信重用。比如有朱买臣、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他们成了武帝的左右亲信，汉武帝经常让他们与朝廷大臣辩论国政得失，大臣多次被驳得无法对答。当然，这些人才带有娱乐性质，汉武帝也未必真的重视，“上以俳优畜之，虽数赏赐，终不任以事也”。这表明，汉武帝心里对人才的斤两还是很清楚。东方朔倒是经常利用时机直言进谏，对朝政发挥了一定的补益作用。

认可汲黯

除了董仲舒外，汲黯的任用也体现了汉武帝的贤明。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提拔任用东海太守汲黯担任主爵都尉，地位与九卿相同。此前，汲黯在东海注重择贤能再放手任用，他本人只布置和检查主要政务，不苛求细枝末节。他曾生病在家一年多，但东海郡却治理得很好，百姓交口称赞他。汉武帝听到了，便起用汲黯。此前，河内郡失火烧毁了一千多家民房，汉武帝便让他去视察，结果汲黯假托天子命令擅自行事，命令官员发放官仓积粮以救济贫民，返回后即请罪。但汉武帝很赏识他，便赦免了他的罪名。

任用汲黯，汉武帝注重的是人才的贤名，属于“国人皆曰贤”一类，同时还注重人才的忠诚与胆略，亲自考察。这样用人，大抵不会有失。不过，汲黯并非完人。史称汲黯为人性情倨傲，当面批评人，不能容忍别人的过失。有一次他犯颜直上，让汉武帝下不来台。但汉武帝最终能容，确是雄主心胸，凡事皆以国事为重，不以私愤而取舍。

当时，汉武帝正招选文学之士和儒家学者，说我想要怎样怎样。汲黯应声回答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意谓心藏很多欲望而表面装仁义，很难达到唐尧虞舜那样天下大治的局面。这简直就是不给人留一点颜面，汉武帝沉默不语，接着勃然大怒，然后脸色难看地结束朝会。退回内宫，还对左右侍从说：汲黯的质朴忠直也太过分了！然而汉武帝终究未对汲黯有什么惩处。

当时，群臣中就有人批评汲黯，汲黯说：天子设立公卿等负有辅佐匡正之责的大臣，难道是让她们阿谀奉承，使君主陷入不仁不义的境地吗？况且我既然已经在公卿的位置上，如果只顾及自身性命，那就会使朝廷蒙受耻辱，那怎么得了！汲黯的确是忠贞为国之士，忠言逆耳，古今有多少人听得烦心，必欲不听而后快，唯雄才大略者有这样的心胸肚量，容得下忠良之言，其虽一时震怒，却终不会加诸半点问责。

事实上，汉武帝对汲黯常常是关爱有加。汲黯身体多病，在三个月的病假期限快到时，汉武帝多次特许延长他的病假时间。后来病重时，庄助替他请假，汉武帝便问庄助汲黯的为人。庄助说：让他任职当官，没有什么超越常人的才能。但要说到让他辅佐年幼的君主，他会坚定不移地维护祖先基业，有人以利禄引诱他，他不会前去投靠，君主严辞苛责地驱赶他，他也不会离去，谁也无法改变他的耿耿忠心。汉武帝说：“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汉武帝对汲黯的认可，亦很中肯。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首次命令各部国各自察举孝廉一人，史称这是采纳董仲舒的建议而采取的行动。

总体上看，汉武帝初任这几年，只是重视人才治国的策略，其雄才大略也未尽展。只是历史的演绎，把时势放在他眼前，由他作出决断，汉武帝顺势而为，也就开启了大汉的强盛时代，而人才也因之辈出。

选人用人史话

一身正气 赢得百邪不侵



尹翁归（？—公元前62年），字子兄（音况），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人。读《汉书·尹翁归传》，顿感袁人的浩然之气从字里行间喷薄而出。

尉。再后来，田延年被选入朝中任大司农，尹翁归因业绩突出，升任都内令，后又任弘农都尉。

赴任东海太守，廷尉不敢请托

尹翁归后被擢升为东海太守。东海郡是廷尉于定国的故乡，赴任前，尹翁归躬身前往廷尉府拜谒，向于定国辞行。有两个与于定国同乡的年轻人，早就探听到尹翁归的行踪，便先于尹翁归来到廷尉府，拜托于定国将他们介绍给新任太守，以求在太守属下谋一个差事，得到特别关照。于定国以为此等小事不足挂齿，满口答应，请他们暂在后堂等候。正说话间，门吏报尹翁归到达。

尹翁归与于定国经过短暂寒暄后便开始叙谈。宾主两相对，纵论天下大事，谈锋甚健，言来语去，相谈甚欢，持续了整整一天，语不及私。于定国始终不敢将等在后堂的两个小同乡介绍给尹翁归。

送走了尹翁归，于定国来到后

堂，对两个小同乡感叹道：“这是一个非同一般的贤能郡守，我看啊，你们如果在他手下当差，恐怕难以胜任。在这样的人面前，我有的只是虔敬和畏惧，不敢贸然启齿以私事请托。”

“三铁”治理东海，举郡景仰太守

尹翁归到东海郡上任后，面临着错综复杂的混乱局面。如何力挽乱局？他采用了“三铁”策略。

一是铁脚走基层，摸清社情建档案。尹翁归一到东海郡，便深入各县邑调查研究，了解社情民意，对官吏的笃实与奸猾、民众的忠厚与不肖，以及各类奸邪和不法案件，都了如指掌，筛查出重点人物，并且督促各县记录在案，分类存档。

二是铁面无私，严格执法。尹翁归办案，明察秋毫，执法如山，对于那些狡黠官吏，不法豪绅，为乱奸民，一概视情节轻重，作出相应惩处，当关则关，当杀则杀，不管是什

么人，绝不姑息。“吏民皆服，恐惧敢行自新”。

三是铁腕行政，立诛首恶。东海郡县有个恶霸土豪许仲孙，目无法纪，为非作歹，上通官府，下结地方黑恶势力，称霸一隅，使附近的百姓吃尽了苦头。前面数任太守都曾试图将许仲孙抓捕正法，都被他借助种种势力的庇护得以化险为夷，金蝉脱壳。尹翁归到任后，迅速查明许仲孙的罪证，保护伞们还没来得及出面说情，尹翁归便果断下令将许仲孙斩首示众。遂使“一郡怖栗，莫敢犯禁。东海大治”。

不幸英年殉职，宣帝降诏旌表

尹翁归治东海政绩卓著，不久，朝廷便提拔他担任右扶风。在右扶风任上，尹翁归依然采用了在东海郡的治理方法。他精心选拔重用了一些清廉严峻的官吏来辅佐自己，待之以礼，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和权力，让他们放开手脚大刀阔斧地开展工托；如果这些人中谁辜负了他的重托，他会毫不犹豫地坚决予以严惩。下属仰慕其人格，又畏惧其严厉，无不如履薄冰般敬业尽职。

尹翁归惩治犯罪，对于一般贫弱的百姓执法较为宽容，对于豪强犯罪则强力打击严惩，毫不姑息手软。豪强一旦被治罪，尹翁归即将其交给掌

宦官，令其给牲畜铡草，而且规定数额、限定时间，不准任何人替代，不能按时完成定额者，便施以鞭笞，强令其去完成更多的定额。“京师畏其威严，扶风大治，盗贼课常为三辅最”。

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尹翁归以盛年病死于任上。他为官一生，一身浩然正气，克己奉公，语不及私，政绩卓著，为官清廉，从不任人前倨傲不逊，死后家无余财，在朝廷上享有崇高的威望。宣帝感慨系之，降诏予以旌表：“朕夙兴夜寐，以求贤为右，不异亲疏远近，务在安民而已。扶风翁归廉平乡正，治民异等，早天不遂，不得终其功业，朕甚怜之。其赐翁归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祭祠。”

如果用尽可能简短精当的文字给尹翁归画像，仅需这样八个字：一身正气，百邪不侵。在一身浩然正气的尹翁归面前，上级不敢以私事请托，下级不敢不尽心尽力履职，皇亲贵戚不敢仗势践踏法律鱼肉民众，贪官污吏不敢以权谋私，恶霸豪强不敢为非作歹，地痞无赖不敢祸害百姓，盗贼不敢啸聚山林作孽为寇，黎民百姓不敢不循其轨、守其业、敬其事。这使我们不由想起孔子的千古名言：“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试撰一联凭吊这位两千多年前的先贤：一身正气铸就百邪不侵金刚身；千古流芳至今万众称颂尹翁归。